



撒切尔首相传

撒切尔首相传

〔英〕肯尼斯·哈里斯 著

冯义华 郑 芮 译

张梦欣 审校

职工教育出版社

根据英国 George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imited
1988 年第一版译出

撒切尔首相传

冯义华 郑芮 译 张梦欣 审校

职工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教场胡同 4 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 8.88 印张 198 千字 印数 1-15000 册

1989 年 2 月第一版 1989 年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9-100-X / K004

定价: 3.70 元

出版说明

1979年，当玛格丽特·撒切尔初任英国首相时，很少有人预料她能象今天这样，成功、愉快地驾驭政府、下院乃至整个英国及其外部的局势。所有这一切，她是怎样做到的？在她上任时，人们普遍认为其政治、经济等策略已经过时、失信和不可接受，而她却成功地运用这些政策为己服务，不仅如此，她的强硬反而使她在下院选举中能以更多的票数三次蝉联首相，开创了160年来英国历史的先例。她又是怎样克服内阁成员如主要保守党成员辞职、隐退所带来的困难而取得成功的？

撒切尔是英国历届首相中唯一创造了一个“主义”的人。那么，什么是“撒切尔主义”呢？这一“主义”真的是重振英国雄风的良策，还是一剂治标不治本的镇静剂？撒切尔又是怎样评价自己的所作所为？她现在在做什么，将来又想做什么？在她心目中本世纪末的英国又将是什么样子的呢？

为了回答这些饶有兴趣的问题，并使我国关心世界政治风云的广大读者，了解这位被国际公认为当代杰出的政治家和“铁女人”的人生哲学、政治主张、工作生涯及其品格作风，我们翻译出版了英国作家肯尼斯·哈里斯的新作《撒切尔首相》。

哈里斯是英国最著名的传记作家之一，因著《艾德礼首相传》而享有盛誉。在写作过程中，他对撒切尔本人、她的众多同僚、朋友以及激烈批评过她的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采访，并对撒切尔在治理英国的做法上受其丈夫、父亲的影响专门作了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从中可以看出撒切尔的确是个非凡的人物，本书正是从各个侧面揭示了她非凡才能之所在。

为了忠实于原作，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者的一些立场、观点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均未做实质性处理，但并不表明我们对此是支持或是反对。请读者注意鉴别。

本书第一——七章由冯义华同志翻译，第八——十三章由郑芮同志翻译。全稿特约张梦欣同志审校。

一九八八年十月

21193/03

作者的话

由衷地感谢理查得·科克特，感谢他在收集和使用资料上给予我的帮助。

感谢威登费尔得勋爵耐心等待我的脱稿，及对文章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同样感谢他的编辑亚历克斯·麦考密克给我的大力支持。还有保罗·邓肯帮助我寻找有关撒切尔夫人早期生活的素材，以及萨利·格里菲斯的誊写和基思·派伊的电脑咨询。

这里，特别要感谢为本书提供资料的作者们，尤其是《格拉斯哥先驱报》的政治编辑杰弗里·帕克豪斯先生，是他们为读者提供了有关撒切尔夫人当代历史的大量珍贵资料。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走访了 65 位各界人士。他们当中有内阁议员、政界著名人物、商人、一般官员和撒切尔夫人的一些私人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希望我在书中提到他们，当然也有些则不然。这里，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肯尼斯·哈里斯

代 序

去年七、八月间，当《撒切尔首相传》刚刚在英国出版的时候，一股喧嚣的“抢购风”正席卷着中国的广大城镇。一时间，大到冰箱、家具，小到火柴、锅碗，过去畅销的，现在价格扶摇直上；以前“卖不动”的，如今成了抢手俏货……双位数的零售物价指数和通货膨胀率，捎带着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敲榨勒索和“官倒”等各种腐败现象，成了老百姓抱怨、咒骂的“热门话题”。与此同时，诊治“经济病”的各种药方也应运而生：有的坚定不移地主张把改革进行到底；有的开始对十年改革产生怀疑；更多的则感到困惑、忧虑和止步旁观。难道我们的改革真的到了叉路口吗？

两个月后，当编者一气读完《撒切尔首相传》的译稿时，思绪顿觉清晰了许多。历史果真是惊人的相似，假如我们超越一下时空的话，就会发现，发生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的通货膨胀及其他经济和社会问题，犹如整个世界经济链环运动中磨擦而产生的一颗火花，在其他时间、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有过迸发，甚至引起过爆炸——譬如撒切尔首相执政前的英国，通货膨胀率曾高达 26%，年财政赤字 100 多亿英镑（1975 年统计数字），市场商品匮乏，经济一片萧条。尽管采取了一系列冻结物价和工资收入等应急措施，仍无法扭转局势，进而引发了罢工风潮并最终导致工党政府的垮台。同样也经过十年，今天的英国又是什么样子呢？仅从撒切尔夫人连续三届蝉联首相、创造了英国近 160 年历史的先例这

事实来看，我们就不难想象开始复苏的英国经济所面临的发展前景有多么广阔。如果再深究一下英国的这段历史，我们还会发现，这种相似并非仅仅是现象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随着飞快的科技进步、激烈的自由竞争和不断提高工作效率，英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文教、国防等公共事业乏人关心；分配不均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自由竞争越来越受到垄断的阻碍……最终引起利益与市场瓜分不均的世界性冲突。1942年，英国社会学家贝弗里奇提出了建立“福利国家”的报告，为战后英国乃至许多西欧国家的经济发展设计了一幅诱人的蓝图。所谓“福利国家”即在混合经济制度下，由政府推行一系列保障充分就业和公平分配的政策，消除日益严重的失业、贫困和不平等现象。这种混合经济表现为国家对私人企业实行国有化或其他形式的参与，干预个人收入及消费。政府通过扩大开支和通货膨胀政策，刺激消费与投资，使失业率保持在3—4%以下，国家大量投资兴办就业、卫生、教育等公共福利事业，保障公平分配、消除贫富不均等等。

从战后到七十年代末，历届英国政府均以维持、保障福利国家的发展为己任，使社会福利事业空前发达。然而，这种政策在提高了广大劳动者的素质、改善了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缓和了阶级矛盾的同时，也给政府的财政金融乃至整个经济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影响：①政府控制的经济资源日益增多，限制了私人市场经济的发展（1973年，政府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为42.7%，1979年达45.7%）；②政府福利开支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收入用于政府消费（如

1979 年社会福利开支占政府开支的 41.2%；1980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82% 是消费性开支），使企业生产缺乏后劲，技术更新缓慢，生产效率下降，而劳动力成本则日趋升高，靠巨额福利开支维持的全体就业成了隐性失业的昂贵面具；③生产投资不足和旺盛的需求导致国债与财政赤字加剧（1981 年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8%，达 120 亿英镑；国债在八年中增加两倍达 118 亿英镑），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传统产业江河日下，新兴产业难以起飞，经济呈滞胀状态；④社会福利计划的不断扩大，引起官僚机构日趋臃肿，效率低下和腐败现象普遍蔓延……数病兼得，使英国社会出现了种种怪现象：提倡消费，抑制积累；鼓励休息，抑制工作；生产效率低的部门能得到巨额补贴，而新技术产业却无资金保障；无技术工人大量流入造成有经验的熟练工人大量流出……至于由此引出的罢工风潮和社会动荡也就不足为怪了。

如果说这些现象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也似曾相识的话，那么本书所叙述的——自 1979 年执政起，撒切尔首相运用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采取紧缩开支等强硬措施，经过十年努力，使通货膨胀率控制在 4% 以下，失业人口减至 300 万以内，财政转亏为赢，社会秩序安定，企业效益提高，经济实力大增……对于当前我们贯彻党中央提出的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策，无疑有着增强信心和借鉴参考的积极意义。

首先，应该承认，我国的经济制度与英国的经济模式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撒切尔首相要做的是把英国从“社会主义”引回到“自由经济的道路”上；我们要发展的则是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某种经济策略的属

性与内容，而首先在于所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的改革开放，是要摆脱贫穷落后，促进经济繁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全体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尽管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很难想象再让大家退回到“记工分”的时代。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决定了我们的选择不是要不要改革开放，而是如何深化改革开放。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我们民族“脱贫致富”的唯一选择。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并非是改革开放所固有的，而恰恰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即需要解决的是具体技术性问题，而不是决策性问题。既然属于具体技术性的，那么同样的问题与现象，在英国能够解决，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解决？何况我们面临的困难远没有英国当时的情况严重。因此，对改革开放这一根本决策，不应有什么疑虑。

第二，应该看到，目前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在经济实力有了长足增长的基础上发生的，与六十年代初的情形不能同日而语。但为什么给人们思想上造成的冲击与混乱却如此强烈？本书中，撒切尔夫人的两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她说：“福利国家应是一个既有梯子又有安全网的社会。人们可以通过梯子一步步改善自己的生活与社会地位，安全网又可以防止人们失足坠落……而战后工党政府在福利国家设置了安全网，却忘记了架设梯子。”她强调：“政策的制定要着重使社会凝聚与团结，而不仅仅是使之变得更富有，应该有决心表现出一种倾向，即在为个人提供各种机会的同时，我们要有意识地培养处于同一社会的人们具有休戚与共的感情。”看来，我们的改革目标不能仅仅停留在让人们“有碗肉吃”的水平上。改革是全体人民的事业，每个人既是改革的受益者，

又首先是改革的实践者。应该唤起所有人——无论是沿海、经济特区，还是内地、经济落后地区——的满腔热情和高度责任感。我们的政策应努力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建立利益共同体，使党、政府和人民能更加真诚地相互理解、相互依存和相互支持，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对此，我们的党风是否端正、为政是否廉洁有着极重大的影响。

第三，撒切尔首相执政以来，推行一系列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如出售房产、使居者有其屋；发展股份经济，即所谓“大众资本主义”，使个人的物质利益与企业、集团的经营效益挂钩；提高信贷利率，大量裁员，紧缩财政，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等等。这些具体技术性措施产生的背景、自身内涵、实施情况及其作用影响等，在本书中都有详尽的阐述、分析，很值得我们各级党政领导、经济界人士及所有关心改革事业的人们参阅、研究和借鉴。

凡能读到这里的人，一定是非常关心我们事业的趋向、进程和我们民族的前途、命运，一定是深深地爱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因此，也一定会在读罢此书后想到这样的问题：“我应该为改革开放这个伟大事业做些什么？”因为本书的主人公也曾说过：“爱，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柳 岸

1989年2月

目 录

一、前途莫测.....	(1)
二、对希思的怀疑.....	(7)
三、共识政治的过时	(13)
四、领袖之争	(28)
五、撒切尔夫人的挑战	(39)
六、阿尔弗雷德·罗伯茨的女儿	(46)
七、最初的搏击	(70)
八、首相其人	(100)
九、福克兰群岛之战	(145)
十、大权在握	(172)
十一、矿山工潮	(185)
十二、运筹帷幄	(215)
十三、展望未来	(258)
注释	(265)

一、前途莫测

无论是保守党成员还是对女首相持批评态度的人，大多数都公认玛格丽特·撒切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杰出的首相：除去领导各党联盟、万众一心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邱吉尔以外，无论是1959年在大选中创记录地取得一连串胜利的保守党领袖哈罗德·麦克米伦，还是在绥靖政策遭到人们指责之前、处于黄金时代的鲍德温，都没有谁的声望能同玛格丽特·撒切尔相比。如果不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年上任的劳埃德·乔治，那么也没有哪位首相能像玛格丽特·撒切尔那样处处走运、吉星高照。1812年、1827年，利物浦勋爵曾两次连任首相，从那以后，唯撒切尔首相任期最长。在英国，可以说玛格丽特·撒切尔是本世纪和平年代最伟大的首相。

英国历史上，除撒切尔之外没有第二位首相创造了用其名字命名的“主义”。未曾有狄斯雷利主义，也未见过鲍德温主义和邱吉尔主义。有社会主义，却不曾有以工党首相艾德礼命名的主义。在政党领袖外，用其他杰出政治人物的名字来命名一种作为连贯政策的载体的主义就更不曾有过了。所谓“比万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比较方便的集合名称、一个破布袋，它把工党内部所有少数派对多数派政策的反对态度都

装了进去，并不代表某种正面的思想。没有什么莫斯利主义，莫斯利只不过是英国的法西斯主义罢了。但是，撒切尔主义的确是存在的。没有玛格丽特·撒切尔，就没有撒切尔主义，玛格丽特·撒切尔过去是、今后也还将继续是撒切尔主义的本质所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历届政府中，数 1945—1957 年的艾德礼政府和 1979 年以来的撒切尔政府最为出色。女首相撒切尔夫人更为杰出。这样说的原因有三：第一、两位首相出任之际都提出了具有广泛争议的、大规模的、旨在变革社会而不仅是管理社会的施政纲领；第二、两人都不食言；第三、两人的政策都建立在道德观念的孰是孰非基础上。艾德礼政府的社会主义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如说和基督精神更接近一些；撒切尔政府的撒切尔主义深受公理会思想、而非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影响。有人曾说艾德礼是英国历史上最讲道德的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崇拜者对她也有类似的评价。

艾德礼下台到撒切尔上任之间的历届工党和保守党政府，从没有一个要立志调整和重建英国社会。在执政期间，它们性质上是实用主义的，行动上稳健温和，两党在共识基础上治理国家；双方在两次大选之间基本保持一致。“巴特斯吉尔”主义这个名词就是这样产生的。“巴特斯吉尔”主义最早产生于战后的第一届保守党政府。这个词的前半部取名于保守党 1951——1955 年的财政大臣 R·A·巴特勒的姓的前半部 Bult，后半部取他的前任、工党的 H·盖斯吉尔 (Gaitskell) 的名字的后半部。从 1951 直到 1976 年，无论哪个党执政，“巴特斯吉尔”主义都被贯彻始终。这可能是因

为两党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一种共识，对政治上什么可以接受和什么不可以接受意见比较一致。“共识政治”的模式应运而生。

回顾自 1945 年艾德礼上台到 1976 年撒切尔夫人就职这 30 年，我们就会发现两党政策存在着一种连续性，以致很难划分保守党和工党。的确，在这期间，不时有重要的新政策产生：哈罗德·麦克米伦的“激变之风”，促进了英国允许非洲自治政府非殖民化和实现独立；爱德华·希思为争取英国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进行的胜利斗争。危机也时有发生，然而，危机本身孕育着时代的变革。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就标志着大英帝国时代的结束。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他们的发展而不是他们的成就。因此纵观这 30 年，年，要想明确区分各届政府的特殊性是很难的。

两党这种政治共识的长期存在把艾德礼和撒切尔奇妙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没有艾德礼就没有今天的撒切尔。战后政治共识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两党谁也不愿抛弃英国政治上的某些特色；第二个原因就是两党都怕一旦他们坚持和另一党分道扬镳、公开抨击对方的一切立场，它自身也就无法在竞选中获胜了。例如：艾德礼政府首先创立福利社会，之后的众多保守党领袖在竞选中都保证他们将继续这一政策。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两党的确有共同的立场。就保守党而言，即使它在某一点上和工党存在严重分歧，它也极力控制自己不在竞选中公开向工党宣战，因为他们很清楚，为了换取选民的支持，有时也不得不穿他人的嫁衣裳。

与信奉政治共识的历届领袖不同，艾德礼和撒切尔都不仅承认，而且明确宣称他们的施政纲领在许多方面同过去是

决裂的，因此在众多的历届首相中鹤立鸡群。战后的英国如果不是全部时期，也是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需要的只是建立在政治共识基础之上的“管理型政府”。且不论该政府是“好”还是“坏”，“管理型政府”在历史上都不可能占有突出的地位。

艾德礼政府和撒切尔政府在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1945——1951年间艾德礼政府引进社会变革，改变的正是撒切尔政府自1979年来所要努力恢复的状况。这就使得两人更引人注意了。艾德礼上台后，引进国有化制度，改造国家的基础工业，用撒切尔夫人的话说，他这是将英国引上了通往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撒切尔夫人执政后，搞非“国有化”制度——进行“私有化改造”。她解散了艾德礼建立的一些福利机构，努力重建以前的价值观念和自由环境，使私人企业进行正当竞争和更广泛的选择。二者相比的奇妙之处正是他们的矛盾所在。前者所致力地往往正是后者要反其道而行之的。

艾德礼和撒切尔不同于其他历任首相的最相似一点就是，都拥有自己的纲领——两个决定英国随后几十年的纲领。艾德礼政府后的30年内，英国政治的主要参数始终是他的政府留下的。这一现象直到撒切尔时代方告结束。今天英国的政治纲领已不再是艾德礼的而是撒切尔的。尽管撒切尔政治到撒切尔下台之前就告结束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但持这种观点的人为数极少，绝大多数人认为未来的许多届政府，无论其政治色彩如何，都将继续按撒切尔今天的方针行事。艾德礼和撒切尔都创造了自己的纲领，并使对手重蹈覆辙。现在的工党领袖尼尔·金诺克不是在接受撒切尔许多思想的同时又在努力寻找一个背离工党过去一贯政策的新政策

吗？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也不例外。我们衡量一个首相所采用的标准，不仅在于他本身开创的变革大小，而且还在于他在多大程度上使对手接受了这种变革、以及这些变革在多长时间可持久不变。依这些标准来衡量，艾德礼和撒切尔都堪称是伟大的首相了。

艾德礼之后的历任首相都一再食言。撒切尔夫人之所以威望崇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她上台后努力兑现自己的诺言，取得了很多成就。英国社会有许多问题长期无法解决，如通货膨胀严重，人民怨声载道。工党、自由党、保守党对此均束手无策。工会势力极大，威胁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国营基础工业亏损严重，效率很低，成为社会负担，到了不恢复私有制便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撒切尔夫人在这三个方面的成就都不小：迅速降低了通货膨胀率，成功地抑制了工会的势力，实现了国营企业私有化。正如我们所说的，撒切尔夫人没有食言，没有上台伊始就同自己的承诺背道而驰。

撒切尔夫人是战后唯一在一片反对声中上台的首相。撒切尔上台时，绝大多数保守党领袖对她均不信任，不赞赏她的观点、政策、人格及方法。她不是他们那种类型的托利党人。她初出茅庐。艾德礼的情形却截然相反，他具备很多有利条件。艾德礼上台时，他的同僚中不乏自以为是最合适的首相人选的人，但一经比较，众人还是共推艾德礼。事实上，艾德礼的政策也是他们自己的政策。全党，上至领袖，下至普通党员，都支持他。艾德礼以其“新政”中标。他的政策向饱经三十年代贫困和失业之患的人们保证能有效地防止灾难复发。他的政策不经验证，就没有理由被否定。再者，艾德礼方案中的不少具体措施都早已被三十年代的实践证明